

羊山战役：“欣看子弟夺城关”

■戚苏源 高 凯

羊山战役是刘邓大军从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前的最后一战。此役，我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两万余人，俘虏该师中将师长宋瑞珂，刘邓大军随后挥师挺进大别山，直捣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，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。

地形险要，强敌据险待援。从地形上看，鲁西南属平原地区，险要之地并不多，羊山就是其中之一。羊山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西北15公里，海拔400多米，因从远处望去犹如一只绵羊静卧而得名。羊山有3个突出山峰，东峰为“羊头”、中峰为“羊身”、西峰为“羊尾”，其中“羊身”最高，为羊山主峰，能够瞰制整个羊山。山脚下是羊山集，羊山集北靠羊山，东西长约1.5公里，有居民千余户，因靠山，房屋多为石砖房。由于地形险要，羊山自古以来便是屯兵据守之地，羊山集周围至今还有明末时期的寨墙，寨墙外东、西、南3面还有侵华日军留下的水壕，易守难攻。

在敌情方面，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是国民党军第2兵团最精锐的部队，配备一流武器装备，师长宋瑞珂在国民党军中属一流军事人才，曾率军重创日寇。整编第66师进守羊山后，宋瑞珂认为我军擅长运动战，很有可能已在路上设伏，决定暂不突围，依托羊山险要地形进行防守，等待援军到来。

初战失利，及时调整部署。1947年7月13日，刘邓大军扫除羊山外围阵地后，立即组织攻打羊山。此时大雨刚过，羊山集附近形成沼泽地带，给部队机动带来困难，且羊山集内国民党军火力可控制羊山周边，有利于其固守和相互支援。刘伯承和邓小平对敌实力有清晰认识，因此以陈再道的第2纵队和陈锡联的第3纵队这两支精锐部队为主



羊山革命烈士陵园内的刘伯承、邓小平塑像

力，第2纵队打“羊尾”，第3纵队打“羊头”，分东西两路同时向羊山发起进攻，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和打援力量部署在羊山周围。敌依靠坚固工事和猛烈火力顽强抵抗，至14日拂晓我军仍未能攻下羊山，被迫撤出战斗。我军对兵力火力进行重新部署后，于17日再次发起进攻，第3纵队在炮火掩护下成功攻占“羊头”，但“羊头”上多为石头，无法构筑工事，天亮后无法固守阵地，只能撤出战斗。第2纵队攻占“羊尾”，后由于敌火力太猛，也不得不撤出战斗。19日我军发起第三次进攻，因连日大雨和敌火力猛烈，最终失利。

此时蒋介石急飞开封，亲自督战，并不断催促国民党军陆军司令顾祝同派兵增援羊山。毛泽东致电刘伯承、邓

小平，确定确保和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，要求陈毅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、谢富治兵团配合向中原推进，并要求陈谢兵团在挺进豫西后归刘、邓指挥。这一部署不仅在兵力上对刘邓大军进行了支援和补充，更在思想上给刘邓大军吃了一颗“定心丸”。刘、邓决心，即使有蒋介石亲自坐镇，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，两人及时调整部署，加强火力和兵力，调集所有可调集的火炮，在发起总攻前，敌我力量对比已为3:10，我军优势明显。刘、邓两人亲临前线，向前线指挥员传达中央军委指示精神，并共同研究打法，在总结此前失利教训后，决定对第2纵队、第3纵队实施统一指挥，便于作战协同。

分割围歼，慑退来援之敌。刘邓大

军决定利用兵力优势，改变以往首先攻“羊头”“羊尾”的策略，转而将“羊身”作为首要目标，力求通过强攻“羊身”，控制制高点，切断“羊头”和“羊尾”、山上和山下敌人之间的联系，从而实现各个击破。7月27日18时30分，我军发起总攻，部队首先对羊山主峰实施持续40分钟的火力打击，而后主攻部队19团3营在炮火掩护下向“羊身”机动，此时敌军暗堡火力点“复活”，“羊头”“羊尾”的侧翼火力也疯狂向3营射击，部队前进受阻。我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，突破敌火力封锁，最终于当晚占领主峰“羊身”，敌虽发起多次反扑，试图夺回“羊身”，均被打退。刘邓大军控制制高点后，居高临下，通过火力网控制羊山和羊山集，将整编第66师分割包围，但敌并未放弃抵抗，双方短兵相接，战斗进入白热化。当时，国民党军援军早已到达羊山附近，但慑于我军“口袋阵”，每天只敢向羊山机动5公里，直到羊山快失守，整编第66师得到的也只是援军的一封封欺骗性电报，战斗意志逐渐耗尽。战至28日中午，我军占领羊山，全歼整编第66师。

羊山战役中，我军全歼整编第66师2.3万人，击落飞机两架，摧毁坦克两辆，缴获野炮、迫击炮28门，其他火炮102门，轻重机枪367挺，长短枪2516支，汽车35辆。羊山战役的胜利，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扫清障碍，受到中共中央嘉奖。此役胜利后，刘伯承赋诗一首：“狼山战捷复羊山，炮火雷鸣烟雾间。千万居民齐拍手，欣看子弟夺城关。”



“它总是一点就着”

M4“谢尔曼”坦克，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装备的一款中型坦克。

“谢尔曼”的绰号是英军起的，来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军名将威廉·特库赛·谢尔曼。在装备美军的同时，该型坦克还提供给英军、苏军使用。

“谢尔曼”坦克的炮塔转动速度是二战所有坦克中最快的，转动一周只需不到10秒；其采用的500马力汽油发动机，可使坦克达到每小时47公里的最高公路速度；发动机的五叶式散热器风扇扇叶角度不同，高速运转时可降低噪音，提高隐蔽性，这一点获得苏军高度评价。

不过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，“谢尔曼”坦克的汽油发动机在带来优异机动性的同时，也成为该型坦克的弱点。

由于汽油易燃易爆挥发，所以“谢尔曼”坦克被击中后经常会起火燃烧，德军因此给它起了个绰号“炊具”。

驾驶操作“谢尔曼”坦克的盟军坦克手，也给该型坦克起了绰号“罗森”，“罗森”是英国知名打火机品牌，其广告词是：“它总是一点就着。”

四叶苜蓿与达索

马塞尔·布洛契(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改姓达索。达索是其兄弟乔治·布洛契在担任地下游击队领袖时取的假名)是法国达索公司的创始人，该公司研制的各型战斗机一直是战后法国海空军的主力战斗机。

二战爆发前，布洛契在避暑时捡到一枚四叶苜蓿(又称三叶草，四叶苜蓿很罕见)，便将其放进皮夹作为护身符。

法国沦陷后，拒绝同纳粹德国合作的布洛契被关押起来。邀请其到战斗机工厂任要职未果后，德军准备将布洛契绞死。好在，他的共产党狱友用前一夜病故的狱友尸体骗过看守德军，助他逃过此劫。

1945年4月，布洛契所在监狱被盟军解放，获得自由的布洛契回到家中，发现皮夹中的四叶苜蓿还在，自此便一直带在身上。四叶苜蓿也成为达索公司商标的一部分。

(徐睿翔)



卫国战争中，穿墙而过的苏军士兵，与德军展开激战



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德军士兵



第一次格罗兹尼战役中，被击毁的俄军步兵战车



格罗兹尼城内满是断壁残垣

城市战：从城墙到城区的角逐

■陈生正 李玉娇

“筑城以卫君，选廓以卫民。”从中国夏朝开始，城市就开始发挥防御功能。放眼世界，围绕城市展开的攻防战，也几乎贯穿整个人类战争史。

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城市战，防御方将很大精力放在完善城墙、城门等外围防御地段，相继形成以马面、瓮城、墩台为代表的城郭防御工程。进攻方要突破这些工事，不得不集中数倍于防御方的兵力攻城，并往往付出巨大伤亡代价。中国历史上的张巡睢阳保卫战、南宋钓鱼城保卫战和元末洪都保卫战等，都是防御一方依靠城防工事，挫败敌重兵进攻的经典战例。

至于国外，围绕城堡、城市展开的战斗，构成中世纪战争的重要篇章。1006年黑斯廷斯战役后，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为以有限兵力控制英格兰占领区，修建许多大小不等的城堡，该做法被欧洲各国效仿。13世纪后，城堡几乎遍布欧洲。为打破这些高大的防御工事，进攻方必须先准备大量物资。1224年，英王亨利三世围攻爱德华福德城之前，仅方铍箭就准备了1.9万枝。

火炮的出现，打破了城市战防御方居高临下、以逸待劳的天然优势。特别是中国的火药西传后，14世纪上半叶，

欧洲制造出发射石弹的火炮，成为攻城利器。1453年，在奥斯曼土耳其攻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，火炮发挥重要作用。特别是在金角湾的决定性进攻中，土耳其军队火炮发射大量石弹，摧毁君士坦丁堡的高大城墙，为战役胜利奠定基础。

现代战争中，城市战开始呈现从线性到立体的拓展。防御方不仅依靠外围城防工事阻挡敌人，还以现代城市高楼林立、街巷分割的建筑群为依托，构筑从楼上到楼下，从地表到地下的坚固防御体系，城市战的主要战场开始从城墙转向城区。

卫国战争中，苏军采取以分队为作战单元、以巷战近战为主要样式的战法，使城市变成吞噬敌军的坟墓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、列宁格勒战役和莫斯科保卫战中，尽管德军突破苏军外围城防工事，但机械化部队进入城区后，受高楼、废墟和街巷复杂地形限制，观察、射击、指挥和协同都十分困难，装甲集群的机动优势难以施展。德军不得不同苏军展开逐街、逐巷、逐楼甚至逐屋的争夺战，推进距离只能以米来计算。德军第6集团军军官汉斯·德尔在《进军斯大林格勒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敌我双方为争

夺每一座房屋、车间、水塔、铁路路基，甚至为争夺一堵墙、一个地下室和每一堆瓦砾展开激烈战斗，激烈程度前所未有。”德军闪电战战术在城市战中毫无用武之地，反而被拖入漫长消耗战，最终彻底失败。

车臣战争中，俄军也经历过血腥的格罗兹尼攻坚战。在1994年第一次格罗兹尼之战中，俄军仓促攻入城区后，装甲部队行动受限，火力和机动性难以发挥，只得同车臣非法武装展开巷战。孤军深入的第131摩步旅和第81摩步团完全陷入被动挨打境地，损失惨重，旅长伊万·萨文等中高级指挥官牺牲。在1999年的第二次格罗兹尼之战中，俄军汲取上次失利教训，在强大炮兵、航空兵火力支援下，出动具有城市作战经验的海军陆战队、陆军特种作战分队和内卫部队等，通过立体突击、分片围歼、肃清残敌等战术，历经3个月苦战，将车臣非法武装主力逼出市区并包围歼灭，取得格罗兹尼攻坚战的胜利。



原典

《百战奇略》害战篇原文为：凡与敌各守疆界，若敌人窺抄我境，以扰边民，可于要害处设伏兵，或筑障塞以邀之，敌必不敢轻来。法(《孙子兵法·虚实篇》)曰：“能使敌人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”

害战篇大致内容为，在敌我双方各守疆界的态势下，若敌侵犯我边界骚扰民众，可在边界要害处设伏兵，或构筑障碍拦截，敌必不敢轻易来犯。诚如古代兵法所说：能使敌不得来犯，是我方占据要害之处，设置困难阻止的缘故。

战例

公元707年，唐中宗命张仁愿接替被突厥打败的唐朝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。朔方军与突厥隔黄河南北对峙，突厥首领每次南下侵唐，必到北岸拂云祠烧香祷告。张仁愿到任时，恰逢突厥首领默啜率军袭击突骑施(古族名)，他认为突厥内部空虚，向中宗奏请率兵攻取漠南地区，并在黄河北岸修筑东、中、西3座受降城，以此切断突厥南下道路。唐中宗批准其请求，3座城垒在60天内修筑完毕。拂云祠的城垒为中受降城，向南通往朔方镇；西受降城向南通往灵武镇；东受降城向南通往榆林镇。3座城间各相距400余里，北面紧靠沙漠，拓疆300多里。同时，张仁愿又在牛头朝那山北设置1800个烽火瞭望台。从此，突厥不敢越阴山放牧，也不再侵扰朔方地区，唐军不仅节省大量军费，还减少驻军达数万之多。

解放战争期间，国民党军于1947年4月3日进占陕北瓦窑堡。得知我军主力在榆树峁子、李家川地区后，敌以8个旅向蟠龙、青化砭地区进犯，同时调动驻守瓦窑堡的135旅，以截断我军退路。我西北野战军决心将敌军主力牵制于瓦窑堡、蟠龙大道以西地区，并歼灭敌135旅。14日8时，敌135旅分两路沿瓦窑堡、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，我新4旅在羊马河以北设伏。9时许，敌军进入我埋伏圈，经7小时激战，我军全歼敌135旅。

计谋分析

料敌于先找准“害”。所谓打蛇打“七寸”，作战中，同样强调既要攻击敌人的“七寸”，又要防止自己的“七寸”被敌攻击，这是“害”战本质。“害”战所强调的“害”，指要害、关键，作战双方无不是为“害”而战，为争利而夺“害”。必须准确找到那些左右战争全局的关键位置，抓住敌弱点，发起针对性打击，同时加强对己方之“害”的保护，方可最大限度发挥“害”战威力。

找“害”，需先敌一步。料敌于先历来是兵家制胜前提，影响战争全局的“害”对作战双方往往是平等的，谁能提前发现，谁就能率先筹划部署抢占先机。那些古今中外善施奇谋的高手，无一不是通过提前找准敌人的“害”，先谋而后动。陕北三战三捷之一的羊马河战役，正是通过前期不断疲惫和调动敌人，成功吸引敌钻进我在要害地区预设的“口袋”，最终全歼敌1个旅。

善借地形利用“害”。“兵凭地而雄，地凭兵而固。”“不知战地而求胜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古代战争中，凭据天然险隘或人工垒障阻敌是最常用的防御手段。可见，地形在“害”战筹划中异常重要，特别是对需预设战场的伏击战而言，能否知战地之“害”并因“害”施策，体现出战场指挥员的指挥艺术。唐朝将领张仁愿面对突厥袭扰，构筑3座受降城而取得明显成效，便是利用人工筑垒设障实现显著防御作战效果的成功战例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现代战争中，“害”战已不仅仅局限于“地利”，自然天候、后勤装备保障和科技等都可能成为被利用之“害”，进而影响和制约战争全局。苏芬战争中，与苏军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芬兰军队能够在第一阶段以小博大、抵抗入侵，并非因其拥有所谓坚固的“曼纳海姆防线”，而是芬兰人充分利用寒区气候条件，在保障己方部队寒区物资充足的同时，采取各种有效战术不断袭击骚扰苏军，而被动挨打的苏军缺衣少食，大批官兵死于严寒。

主动出击转化“害”。“害”战绝不可简单理解为被动防御。在要害处构筑障碍拦截敌人也好，设伏兵也罢，都仅是一种确保自身不败的举措，对敌杀伤和牵制并不大，其所希冀达到的“使敌不得至”，也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状态，主动权在敌不在我。盾再坚固，也不能放弃锋利的矛，要打赢“害”战，应当择机对敌之“害”主动出击，迫使不战自乱，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1947年8月7日，刘邓大军突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，千里跃进大别山，一举开辟中原战场，将战争引入国统区。蒋介石不得不命令两翼执行重点进攻的国民党军向中央收缩，其精心策划的全歼山东、陕北我军，转而直取华北、东北的计划彻底破产，减轻了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压力，并为之转入全国性战略进攻奠定坚实基础。



西受降城遗址